

命
匠

陆天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命
运

陆天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 / 陆天明著.-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404-4227-9

I. 命…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52338号

命运

陆天明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项目策划: 谢不周 周艺文

选题策划: 邓映如 简以宁

责任编辑: 谢不周 邓映如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新华书店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印制: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 / 16

字数: 600千字

印张: 32.5

印数: 1-10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4-4227-9

版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服务电话: 0731—2801361

下午三四点钟，缓缓隆起的地平线上，躁动地堆积起一层层乌云。同样在这个下午的三四点钟，一八四团团关向民心里却有点烦。说准确点，应该是很烦，非常的烦。当时，部队正奉命向紧邻香港的深圳宝安一线紧急开进，去制止边民外逃。而在十分分钟前，关向民却得到三营八连连长的报告，说他们连的老兵冯宁表现异常“反常”。这个冯宁因脚伤在团卫生所治疗多日，始终未愈而没能归队，在这次行动之前，经师党委核准，已被列入留守人员名单；但得知今天部队要出发，仍需拄双拐行走的他，却突然强行冲出卫生所，蹿上个出租车，一路追赶到火车站。当时大部队都已上了闷罐子车，军列也已经缓缓启动。他全然不顾站台上铁路公安的大声喝阻和竭力拦截，扔掉双拐，纵身一扑，钻进八连所在的那个闷罐子车厢里，“死皮赖脸”地随部队一起往南边来了。当时的情形真可以说惊险万分。就在他纵身一扑，伸手抓住车厢门上那冰冷的铁把手的瞬间，列车突然加速，他的下半身差一点被甩进急速滚动的车轮里。若不是这小子手劲儿足够大，抵抗住了车轮飞速旋转时产生的那股吸力，他的两只脚，连带两条小腿，肯定就会在车轮和钢轨的无情噬合中轧成了肉酱。且不说由此给他本人的后半生将造成什么样的恶果，更严重的是将延宕阻滞整个大部队的行动。军区首长在给一八四团传达由军委下达的这次行动命令时，反复强调，深圳紧邻香港，最近处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多年来，许多边民就是利用深圳这个地缘条件，不断地在此“闯关”外逃。当然，更多的人（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是从邻近的海上泅渡去香港，有人中途被淹死，因而海面上随波逐浪地漂浮起几百具尸首的事情已不止发生过一起两起。边民外逃事件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和社会稳定，已成了中央和相关地方政府的一大心腹之患。为此，年年大张旗鼓地采取各种措施，内外结合，上下齐心地防外逃，治外逃。但“外逃”之风却依然像盛夏的韭菜似的越割越盛，越演越烈。在这样的情势下，军委下决心把一八四团这样一个著名的“红军团”拿上去，布防深圳宝安。团党委首先的一条，当然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在边境线上修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坚决制止住多年没能堵住的外逃现象，为中央分忧，为人民再立新功。在这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严防队伍内部发生任何变故，尤其是不能跑了人。军区首长着重指出，一八四团最后能不能堵住外逃，这取决于众多因素，但是带好部队，决不发生一例官兵外逃事件，是作为一团之长的他的应尽之责，必须做到，也是应该能做到的。如果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跑了人，别说跑多了，只要跑了一个，“红军团”这面光荣的旗帜，也就算彻底砸了。“到时候，你关向民少说废话，带着请辞报告回来见我！”所以，在得到三营八连连长的报告后，关向民绝不敢有半点疏忽，

马上想把这个冯宁找到团部来，严肃认真地谈一谈，摸摸底。

冯宁是个“老兵油子”。关向民不相信他此次“强行”随大部队南下，会是出于“为中央分忧，为人民再立新功”的高尚动机。关向民做出这种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这个冯宁是关向民一个老首长的儿子。老首长离开部队早，转业回东阳老家办教育，两人多年没联系。一直到五年前，关向民带队去东阳市征兵，老首长突然找到征兵办公室，把儿子托付给了他。这个冯宁聪明，肯干，也能吃苦，这一切都是没啥可说的。但当兵五年了，却一直没能解决组织问题，也就是说一直也入不了党，也没提干。这要是在地方上，也许不算是一档子特别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在部队上，尤其是在“红军团”这么一个有光荣政治传统的部队里，一个老兵，五年了，既解决不了组织问题，又提不了干，自己不提出退伍的要求，组织上也不让他退伍，上上下下都会觉得这样的事非常“怪异”。其实团里早有领导主张让冯宁脱军装走人。但在团党委会上，只要讨论到这档子事，关向民总也不表态。党委的其他领导也都明白老关的为难：冯宁在他管制下五年没入党没提干，就这样让他走了，他觉得没法向老首长交代。而让人感到更“怪异”的是，直接管着冯宁“进步”大事的营连两级组织，一方面总是反对让冯宁入党和提干，另一方面却又老不放他脱军装走人。这个冯宁虽然好犯自由主义，又有点“吊儿郎当”，自由散漫，不服管，但是真正交给他个什么任务，他总能完成得很好。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这小子脑袋瓜特别好使，当他来劲儿的时候，经常能给连长营长出一些非常好的点子，帮着营里连里把工作做好，而且在一些后进的战士中，他还拥有一种特别的威望，在关键时候总能让他们不出什么问题，出色地完成某些突击性的军训和生产任务。而且在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后，他还从来不与营里连里邀什么功，不与别人争个什么荣誉，这一点又让营连领导特别舒心。关向民也曾多次找他谈过话，甚至很明白地告诉他，论能力，他完全可以当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把一个连，甚至把一个营带好。只要改掉忽冷忽热自由散漫的毛病，听话，踏踏实实地干，在部队他会有无比光明的前途。但这个冯宁对这个“个人前途”问题，似乎完全不在乎，仍然改不了热一阵冷一阵，一会儿认真，一会儿又疲疲沓沓的老毛病。所以，在得知他今天突然铆足了劲，冲出卫生所，不顾一切地要跟部队南下到深圳宝安后，关向民很自然地凭直觉就断定冯宁此举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阴暗打算”……

让关向民焦虑的还有，一些基层领导完全认识不到部队面临局势的复杂性。他曾找三营八连连长谈过一次话，要求八连连长好好地做一下冯宁的工作，让他先去摸一摸冯宁的思想底牌：“他为什么不顾脚上有伤，拼死也要跟着大部队到南方来？这里的真正原因，你们摸透了？”

八连连长只是一愣，说道：“这还能有什么原因，不就是想跟着部队一起行动呗。”

团长告诉他：“别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八连连长却说：“那还能有什么原因？”

团长说：“你知道我们这回建制地拉到深圳宝安，要执行啥重大任务吗？”

八连连长说：“制止边民往香港那边跑。”

团长说：“知道香港是个啥地方吗？”

八连连长说：“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桥头堡。”

团长说：“制止边民外逃，是一场重大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如果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反而从我们部队里跑出去一个两个战士，这会造成什么严重的政治影响，我想不用我说，你也会掂出这里的分量！”

八连连长听团长这么说，反而笑了，说道：“战士外逃？你说冯宁这小子会叛逃到香港？哈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关向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呵斥了一声“八连长！”

八连长这才不做声了。

八连长在团里还算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基层干部。而抱有这种认识和态度的连营干部绝对不止八连连长一个人啊！

因为整列军车挂的都是闷罐子车厢。闷罐子车厢之间是互不连通的。要把冯宁从三营八连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里找到团部所在的这节闷罐子车厢里来谈话，只有等停车以后，才有可能。

傍晚时分，军列行进到一个三等小站，终于停了下来。部队要在这儿休整一小会儿。开饭，让各连整理一下车厢内务，比如，各连队值勤的战士得赶紧抬着自己车厢里那个沉甸甸的大尿桶，匆匆向车站上那个又小又脏又臭的半露天的公厕跑去，待清空了它，再赶紧将它刷洗干净。趁隙，也让官兵们到站上去透口清爽的空气，活动活动腿脚。三营八连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离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并不远。因为是紧急召见，关向民觉得，即便算上吃饭的时间，七八分钟之内，冯宁也应该能出现在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里了。但过了二十分钟，冯宁还没有露头。关向民有点恼火了。这小子完全目中无人嘛！疲疲沓沓到了这种地步！他马上找来通信员，让他赶紧跑步前去通知八连连长，让八连连长立即带着冯宁跑步到团部来见他。没成想，命令刚出口，还没等通信员转身跑去，值星参谋的哨子声却在前边响了，军列又要启动了。

其实，接到团长第一道“召见”令，冯宁就动身向团部来了。当时他刚打上饭菜，都没等吃上一口，就端着那只军绿色的搪瓷碗，一手攥着两个大白馒头，一瘸一拐地往团部赶。他平时确实有点自由散漫，但五年行伍生活的磨炼告诉他，对于“团长召见”这等大事，还是不能怠慢的。但当时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不大不小的事，也是他想不到，挡不住的。在他紧赶慢赶向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走去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有一阵窸窣窸窣的脚步声响，好像有什么人在尾随自己，稍稍迟疑了一下，回头看去，却是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可怜兮兮地跟在他身后，显然是来讨饭吃的。

冯宁稍稍打量了他们一下，便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分给了他俩。

孩子拿着半拉馒头，欢天喜地地说了声“谢谢解放军叔叔”，扭头跑了。

冯宁心里有点酸涩，怔怔地目送两个孩子跑远，刚转过身想继续向团部走去，只见从

路轨对面的灌木丛中呼啦一下又窜出一群孩子，把他围住了。他们大都跟刚才那两个孩子一般大小，或七八岁，或十一二岁模样，也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贪婪地看着冯宁手中那个冒着肉片香味的搪瓷碗和剩下的那个又白又暄的大馒头。

冯宁有些为难了：孩子太多，而馒头却只有一个。给谁？这种选择显然会让他陷入另一种“残酷”。一时间，冯宁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连长匆匆走过来催他：“你怎么还不上团部去？”

冯宁忙应了声“我这就走”。

连长又补充了一句：“别磨蹭。你知道团长的脾气！”

冯宁犹豫了一下，问：“团长这会儿找我，会有啥事？”

连长苦笑笑：“我想肯定不会是表扬你吧。”

冯宁傻愣了一会儿，看着连长走远，又迟疑了一下，把剩下的那个馒头再掰成两半，分别给了眼前最小的两个女孩，再把碗里的菜倒给了一位跟在这群孩子身后、也来乞讨的一位老大爷。这位老大爷身旁还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也许因为她比在场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大一些，虽然同样的饿，同样需要食物，但还是不好意思往前挤。在饥饿和食物面前，居然还知道谦让，这让冯宁特别地看了她一眼，同时也注意到了这小姑娘的清秀和文静，有一瞬间，甚至想把菜给了她，但比较了一下眼前那个老大爷，他还是决定救助更可怜的老人。这时，他忽然间又想起，腰间还有一小袋炒熟了的玉米粉，那是连里发的“备用干粮”。但那袋子的绳结打得太死，一时半会儿怎么也撕解不开，只得作罢，赶紧向团部走去。这么一耽搁，二十分钟就过去了，再往前走了几步，值星参谋的哨子声已经响起。这时，他本该继续向前快走几步，赶在列车启动前，冲进团部所在的那节车厢里去见团长的。换了谁，都会这么干。因为反正连长已经知道他是被团长召去谈话了。回不回连里并无所谓。而此刻见到团长，解释清楚“误会”，当然是头等重要的事。但是，冯宁却偏偏做了另一种选择。从本意上，冯宁并不想去应付团长的“训斥”和“追问”。他意识到，团长这时候找他，跟他这回“死皮赖脸”地跟着队伍南来有直接关系。他知道自己此举违规了。他违规自然有他的理由，而他的理由又是没法向别人公开说出口的，尤其是没法向团长那样的“大领导”解释得清楚。就是解释清楚了，他也并不准备，也不愿意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这个理由。为此，他料想到了团长跟前，自己会相当的难堪和尴尬。正是在潜意识中害怕经历这种难堪和尴尬，在哨子响起的那一瞬间，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向后转身，向着自己连队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跑了过去。他此刻当然不会知道，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居然会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完全改变了他后半生生命之路的走向，也给他平添了如此多的坎坷和风险波折。

二

一八四团奉命向深圳宝安开拔的那个晚上，在广州军区大院里同样并不平静。司令员和政委接到省委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通知，中央首长到南方视察，特别关注深圳宝安一带边民外逃的情况。当天晚上省委要向中央首长做这方面的专题汇报，省委书记钟灵请司令员和政委一起参加这个汇报会。司令员向军区作训部部长询问了一下目前一八四团到达的位置，又吩咐了：“通知一八四团，从现在开始，每两个小时报告一次沿途情况。到达深圳宝安以后，每隔一个小时报告一次当地情况。”

这时，军区政委已经在大楼前等着他了。

司令员个头不高，身板敦实，为人豪爽，向政委挥了挥手说道：“赶紧上车啊，钟书记来电话催咱们了。”

政委微微一笑道：“走，上我的车。”

司令员一笑道：“干吗要上你的车？”

也许因为身前身后还有一些随员跟着，政委没直接回答司令员的询问，只是笑笑：“走吧走吧。”

司令员当然知道政委不会无缘无故让他坐一个车走的，一定是途中有话要对他说，便没再追问下去。果不其然，等上了车，政委便神秘地压低了声音问司令员：“知道今天来听汇报的中央首长是谁么？”

司令员故意地：“谁？”

政委笑道：“行了吧你，你会不知道？”

司令员提高了声音反问：“哎，我为什么就一定得知道？”

政委笑道：“还跟我保密？”

司令员诡秘地打量了一下政委，伸出一根粗短但并不笨拙的食指在掌心写了个“邓”字。

政委眉毛一耸，一震道：“真是小平同志？”

司令员微笑着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时，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响起，一场特大的暴雨降临在广州上空。豆粒大的雨点像子弹般击打在这辆黑壳子的大福特车顶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然后两人便都沉默了下来。马上要面对邓小平同志，让这两位担负着指挥中国最重要战区之一重任的军政主官不能不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奋，又感到异常的压力。而这种气氛同时也在省委大楼的某几个办公室里传播着蔓延着。特别是在省委书记钟灵的办公室里，为向小平同志汇报做准备，在一个很小范围内，专门召开了个会议，以汇总各方面的情况和数字。这时，会议已临近结束，办公厅的一个秘书匆匆走进来向钟书记报告，军区那边，司令员和政委已经出发。钟灵忙站了起来：“那好。我们也该过去了。”但他刚宣布散会，省公安厅参加会议的一位领导忙站起来请求道：“能允许我最后再说一句吗？”

钟灵站住了。

那个公安厅领导犹豫了一会儿，欲言又止。

钟灵微笑道：“说呀，别让小平同志和叶帅等我们。”

那个公安厅领导还在犹豫。他犹豫的是，在刚才的准备会上，讨论到如何对“边民外逃”事件定性时，他非常意外，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震惊，钟书记居然对多年来一直把“边民外逃”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持怀疑态度。“在这么多的外逃人员中，肯定有一些是受到地富反坏右敌特分子煽动而出逃的。但是，能不能从整体上说，外逃事件就是由于地富反坏右敌特分子策划组织的，就应该把它定性为‘恶性的政治事件’？”钟书记虽然是用一种询问的口气来说的，但他的倾向性应该说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明显地倾向不能把边民外逃定性为“恶性的政治事件”，也不能说，边民外逃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台湾派遣的敌特分子策划组织的。这种倾向性，实质上是对这么多年来一种思维定势的颠覆。钟书记刚到广东，可能还不太了解广东地处沿海，又濒临港澳的全部复杂性。要不要向书记说明这里的一些背景情况呢？经过犹豫，他觉得还是应该把情况向书记说明清楚才对。

“多少年来，从上到下都把这一类边民外逃事件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是地富反坏右敌特分子煽动组织的结果。如果今天我们不顺着这个思路去汇报，后果难以预料。”他说道。

钟灵沉吟了一下，反问：“你觉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那个公安厅领导说道：“如果我们说边民外逃不是地富反坏右和敌特分子煽动组织所造成的，万一中央首长追问，那么又是谁在这里起作用，是谁造成这成千上万边民外逃的，我们怎么回答？”

钟灵笑了笑说道：“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怎么回答。”

那个公安厅领导道：“可是……多少年来从上到下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一直是这么执行的。”

笑容慢慢从钟灵的脸上消失，他知道，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多年来所形成的那种习惯性思维模式和某些固化了的结论，而且眼前也没时间允许他们继续再对此展开详细深入的讨论，便淡淡地笑了笑：“咱们总不能把几万几十万逃港人都说成是‘敌人’吧。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确定下来。至于其他方面的认识问题和政策性问题，我们暂不下结论。特别是可以听一听中央首长的看法嘛。”

那天的汇报，是在广州珠海宾馆一号楼里进行的。会客厅朴素而宽敞。

钟灵先大概地报告了这些年外逃的基本概况：“在深圳宝安一带，这二十年，具体地说，从五七年开始，后来又又在六二年、七二年，多次发生这样的边民外逃事件，大批乡民、渔民外逃香港。迄今为止，这股逃港风一直没能得到有效制止。而且据情况报告，近期在深圳宝安一带还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逃港事件。”

邓小平一直在非常注意地倾听着。

省委副书记宋梓南插话道：“多少年来，我们这里一直习惯性地把这一类事件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认为是由台湾国民党敌特分子和本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煽动组织所造成的。”

宋梓南突然把这个问题提到小平同志面前，让在场所有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都振作起精神，非常关切地看着邓小平，他们都想知道邓小平对此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出乎意料的是，邓小平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他只是默默地朝宋梓南看了一眼，略略地沉吟了一下，回过头来问钟灵：“这些年，前后一共跑了多少人？”

钟灵答道：“关于这个人数问题，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官方的统计，大约为十一万九千二百七十人次，真正跑到香港去的约有六万零一百多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民间的，那个人数，听起来就有点离谱了。”

坐在邓小平身旁的叶帅问道：“离谱？离谱有多少？”

钟灵笑了笑，把身子往后仰了一下答道：“一百万哦。”

邓小平和叶剑英不禁都略略一怔。

这时，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赶到了。由中办的同志把他们引领进会客厅。司令员政委分别向邓小平和叶剑英敬了个礼。

叶帅一边微笑着做了个手势，让他们两位坐下，一边告诉邓小平：“最近有关方面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请求加强深圳宝安方面的边防力量，以制止边民外逃。”

邓小平当时刚复出，还没有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但对军队工作饶有经验的他对这一方面的事情非常敏感，立刻反问道：“要求增派部队？”

叶剑英答道：“是的，军委决定调一个团，布防深圳宝安边境一线，力争在短时间内有效制止这股逃港风，给全国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大气候大环境。”

邓小平看看叶剑英，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问钟灵：“钟灵同志，听说你最近到边境几个县做了一次实地调查。你说说，你是怎么看待边民外逃问题的？”

邓小平要让钟灵表态，这让省公安厅的那个领导有点紧张起来。以往的经验告诉他，在完全不知道首长的倾向前，要对这么重大而敏感的问题表态，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万一说岔了，往往会给首长留下不好的印象。虽然没有接触过小平同志，也不知道小平同志历来是如何对待在重大问题上与他持不同看法的同志的，公安厅的这位领导此刻还是很为省委书记担心。

素有中央工作经验，也比较了解小平同志为人的钟灵显然从容得多。他答道：“边民外逃的问题，一直让沿海各级党委和政府感到非常头疼，也觉得非常难办。可以说多年来屡禁不止，收效甚微，至今还在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团结，影响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进行。在怎么看待这件事的问题上，党内也是有争议有分歧的。”

“你呢，你是怎么看的？”邓小平追问。

“如果我们把边民外逃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地富反坏右和敌特分子组织煽动这一点上，有一个问题显然解释不通。”经验丰富的钟灵没有马上从正面回答。

“哪个问题解释不通？”

“这些年抓阶级斗争，抓对敌斗争的力度不能说不大，在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的情况下，为什么边民外逃的现象反而越演越烈？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应该加以特别注意的，那就是发生边民外逃的地方都是比较贫穷的地方。当地老百姓的穷困程度，可以说难以想象……解放快三十年了啊，有些景象真的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小平同志。”说到这里，钟灵的眼眶有些湿润了。是的，中央把他调到广东来担任省委书记后，他立即驱车走了不少的穷困县。实地看到的一些情况让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建设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许多农民依然挣扎在饥饿和极其贫困的生死线上。

善于抓问题要害的邓小平立即概括道：“你的意思，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太穷了，我们的经济太落后了，也因为我们没做好工作，所以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边民外逃事件？”

邓小平把问题一下提得如此尖锐和明确，倒使钟灵有一点犹豫了。他的犹豫并不是他本人对这个结论还有什么不认可。现在的问题是，在省内，尤其在中高级干部中，对这个结论还持怀疑，甚至是排斥态度的同志，还不在少数。怎么说，才既能向小平同志说清楚这个情况，又能说得比较得体呢？

这时，在场的人一下也都有一些紧张起来，他们关切地看看钟灵，更注意地看着邓小平。他们想知道邓小平的态度。

省委副书记宋梓南特别注意地看着邓小平。前不久，他曾经陪同叶帅去下边一些县市转了转。叶帅痛心地对这位省委副书记说过这样的话：“梓南啊，我们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百姓生活得更好一些呢？我们是共产党啊。解放三十年了啊，不能再让老百姓这么穷下去了。”当时他无话可说。

这时，钟灵也怔怔地看着邓小平，希望他能明确表个态。

在座的其他领导这时也都把期待的目光转向了邓小平，急切地想知道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但邓小平却收回了询问的目光，低下头去沉思了，稍稍坐了一会儿，本能地伸出手去拿起一支烟。

一位同志赶紧拿起火柴，划着火，递了过去。

邓小平拿起了烟，但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他缓慢地本能地按捏着手中那支精制的熊猫牌香烟，似乎没有看到对方递过来的那根火柴。

那位同志当然不好意思去打搅邓小平，只是拿着那根燃烧着的火柴，不无尴尬地在一旁呆坐着。不一会儿，火柴快燃到头了，他只得悄悄地把它扔了。

这时，宾馆的主管领导走上楼来，走到会客厅门外。中办一位穿中山装的秘书上前迎住了他。

那位主管领导低声地问：“晚饭准备好了，我们来请示一下，首长什么时候用餐？”

中办秘书低声地答道：“等通知。”

宾馆的主管领导又问：“大约还要等多长时间？”

中办秘书再一次简略而又坚决地重复道：“等通知。”

而这时候，会客厅里依然是一派肃穆。在座的人依然在静静地，甚至可以说是屏息静气地期待着邓小平表态。

这时，雨停了，但由于室内异常寂静，在微风的吹拂中，依然能听到檐滴持续滴落到砖地上所发出的那一下下清响。

邓小平依然在深思中，手里还在下意识地抚弄着那支精制的熊猫牌香烟。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边民逃港，当然不是件好事。但不管跑出去多少，是六万人，还是一百万人，这总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打量了一下眼前省里的那些同志，这时，似乎意识到自己手里还拿了支烟，便低头去茶几上寻找火柴。

那位同志忙拿起火柴，再度划着后，向邓小平跟前递去。

邓小平从容地点着烟以后，转身对着钟灵又加强了语气，把这句话重复说了一遍：“这总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然后转过身来对军区的两位主要领导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件事不是你们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军区的两位领导也许觉得小平的这句话解除了军方在这起重大“恶性政治事件”中的责任，而略感欣慰，神情稍稍显得轻松了一些。

邓小平的回答当然是钟灵期待之中的，但政治上非常老练的他仍然保持了原先的神情，平静地等着小平同志继续说下去。而在场多数的同志则都颇感意外，感到内心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巨大冲击。如果把造成成千上万边民外逃的原因归结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那么，又该怎么来评价我们这三十年的成败得失呢？如果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那么又该怎么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呢？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政策调整才能让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千万计，以至亿万计的平民百姓安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不再外逃？这样的调整会不会产生颠覆性的政治后果？在国际上，尤其对正处于矛盾重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共和国的“封疆大吏”和“重臣”们，一时间，甚至都不敢再细想下去了。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这种心理的冲击来自何方，更说不清这种冲击会引发什么结果，但潜意识却告诉他们，小平同志这种崭新的看法已经让他们内心产生了一种从未经受过的激荡和激励，一种让他们同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激荡和激励，由于这种说不清道不明，也使他们一时间感到了一种茫然，一种不解，使他们有些面面相觑，但在小平同志面前，他们又不便表露出什么，便只是僵僵地坐着，保持着那种礼貌的和恭敬的沉默。

三

值星参谋嘴上的哨子吹响了，紧接着火车头那边也拉响了汽笛。大约有十几秒钟的时间，悠长尖厉的哨音和粗犷凌厉的汽笛声啮合在一起，好似一股凛冽的强风摧枯拉朽般掠过荒原。士兵们纷纷上车。车轮缓缓转动时，那些乞讨的孩子和老人马上向车厢跟

前围去，并且跟着移动的车厢跑了起来。不管讨到食物，还是没有讨到食物，都伸出他们瘦弱和肮脏的手，有的孩子则使劲敲打着车厢板，大声叫喊：“解放军叔叔，再给点吃的吧……”

一些士兵围在虚开着的车门前，心情复杂地注视着那些拼命跟着列车在跑的孩子和老人。

连长大声吆喝：“关上车厢门！”

但没人执行这命令。

连长拔高了声音，再次喊叫：“列车在行进，关上车厢门，听到没有？”

虽然有人离开了门前的那地方，但仍然没有人去关门。

连长气冲冲地走了过来，用力关上了门。但突然间，他愣了一下。在关门的一刹那，他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什么，但又不确定。他呆了一下，赶紧转身去重新打开车厢门。他向车下看去。孩子和老人仍然在奋力追着列车。但这支“奔跑的队伍”显然已经在分化了。年龄太小的太老的体力太弱的，已经跟不上列车逐渐加快的速度，而落在了后头，有些则已经清醒过来，明白这么傻跑，并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也就放慢了脚步，但仍有一些孩子“倔强”地追着。不一会儿，他们中的大部分也都跑不动了，一个个蹲在站台上或路轨旁，喘去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女孩，还在跑着。她就是刚才站在那个老大爷身旁，长得特别文静和清秀的女孩。因为不好意思跟年龄比她小的孩子争，她一直也没讨到吃的。眼看军车要走了，她才真正着急起来。

“丫头，别跑了……危险……”连长冲着车外叫道。

女孩流着泪，乞求着：“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我奶奶……我奶奶……饿……”

连长本能地掏了一下自己的口袋。口袋是空的。他忙回头冲着车厢里吼：“谁还有吃的？”车厢里的战士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了一下。连长再喊：“都聋了？谁还有吃的？快！”战士们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翻找。有人递过来个玉米饼。有人递过来一小包饼干。冯宁再一次想起自己腰间的那一小袋炒米粉。但解了一会儿，还是没解开那绳结。

这时，连长接过战士们递过来的东西，向小女孩递去。

连长的手刚要接近小女孩伸长的手，列车加速，这时，小女孩也真有些跑不动了，脚下不自觉地放慢了速度，因此，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又拉开了。连长只得一手紧拽住门框，尽量向外探出身去。于是，他的大手又渐渐接近那只小手了。但就在快要触碰到那只小手的瞬间，列车的速度又加快了。这时，小女孩已经累得不行了，奔跑中打了个趔趄，差一点摔倒。

小女孩越跑越慢，列车越走越快。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小女孩无奈地绝望地哭喊着：“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连长只得把手里的东西往车下扔去。冯宁也急了，用力一扯，把绳结扯断，摘下那个小米粉袋，向车外扔去。玉米饼和饼干落到离小女孩不远的地方。而那一小袋炒米粉在空中被风一吹，便纷纷扬扬地飘洒开来。小女孩拣起玉米饼和饼干，把它们紧紧抱在怀里，满脸是泪地对着远去的列车不停地鞠躬，嘴里不

住地念叨着：“谢谢解放军叔叔……谢谢解放军叔叔……”

连长最后一次用力关上车厢门后，车厢里一下暗了下来，也安静了下来。谁都不敢出声，因为刚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执行连长关上车厢门的命令，大伙都呆呆地在等着挨连长的训斥。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们看到靠着车厢壁站立着的连长突然垂下头，眼角处也湿润了，并止不住地滚出两颗硕大的泪珠来……

军列到下一个停靠站时，团长立即把冯宁叫到自己跟前。在问清了上一回为什么没有按时到团部来谈话的原因后，团长稍稍平静了些，然后不紧不慢地问：“当兵五年了？”

冯宁点点头，并且补充道：“五年零八个月还缺两天。两千零六十六天。”

团长冷笑着挖苦道：“真是度日如年哪！”

冯宁忙立正道：“没有！”

团长驳斥道：“都在按天算日子，还没有？”

冯宁忙应道：“按天算日子，只是我的习惯而已。”

团长瞟了冯宁一眼：“五年前，可是你爸亲自把你交到我手上，要我为你今后的一切，向他负全责！”

冯宁没做声。

“当了五年的兵，连个组织问题都没解决，你说我怎么跟你爸交代？”

冯宁仍然没做声。

团长长叹一声：“你怎么就不能好好地学学你爸！多好的一个老同志，活脱脱现成的一个人生榜样！你爸像你这么大，已经是一个老党员了，早当了共青团的区委书记了！”

冯宁还是不做声。这时他能说啥呢？

“你跟我说个实话，你，冯宁，到底为什么不顾脚上的伤痛，拼死拼活抢着跳上火车，要跟着大部队上南边来？”团长接触实际问题了。

“这怎么说呢？”冯宁想了想，答道。

“怎么想就怎么说嘛。别跟我玩花招！”团长正色道。

“我……我听说深圳宝安那地方离香港特别近……”冯宁吞吞吐吐。

团长瞪大了眼睛追问：“那又怎么样？”

“没怎么样……”

“什么叫‘没怎么样’？没别的想法，你上南边来干啥？”

“我……我也就是想凑近了瞧瞧这个香港到底是个啥模样的……”

团长一下站了起来：“你！就这么简单？”

冯宁迟疑了好大一会儿：“我想……我在部队也五年了，再磨蹭下去，的确也讨人嫌了。确实也到该我脱军装的时候了。退伍以后，我还能干啥呢？”说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回老家呗，我爸一定会给我在老家找一个特别安逸的工作，再替我找一个特别贤惠的媳妇，让我们再给他老人家生一窝特别听话的孙子孙女，咱老少三辈儿也一定活得皆大

欢喜，举世太平。我，也就没那可能再往这边来了。所以……所以……所以……”

“所以就想过过来就近瞧瞧香港？”

“咱们跟资本主义斗了半天，啥是资本主义都没瞧一眼。冤不冤？”

“只是想瞧瞧？”

“那我还能想啥？叛逃？”冯宁反问道，说着，还苦笑了一下，“我有那个胆吗？”

“别跟我嬉皮笑脸，冯宁！香港那么个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有啥好瞧的？你到底有什么行动计划，跟我说实话！”

冯宁：“报告团首长，我真没想干啥，就是一个好奇。就是想到，过了这个村，就再也沒这个店了。就是觉得自己在部队天天哭着喊着要跟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可是一直也没见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到底是个啥模样，好不容易走到这资本主义跟前了，不瞧上一眼，就这么脱军装回老家，觉得有点冤。”

团长眯起眼：“不会吧……就是一个好奇？就是想瞧一眼？冯宁，你不会又在跟我要什么花花活儿吧？”

冯宁：“报告团首长，就是一个好奇，就是想瞧那么一眼。觉得挺好玩的。您要不信……我也没招了……”

团长：“挺好玩的？”

冯宁：“正经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好玩？”

“冯宁！”团长大声叫了起来。

冯宁愣怔住了。他不知道团长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吼叫。想看看真正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想法，有啥不对的？

团长：“不是我不信，谁都知道你冯宁心里鬼点子多！”

这句话显然深深刺伤了冯宁的自尊心，一瞬间，那常见的似乎总有点玩世不恭的微笑从他脸上突然消失，脸色也苍白起来。怔怔地伤感地看着眼前这个老首长，嘴唇微微哆嗦起来，他不知道怎么才能向领导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怎么才能证明自己绝对不会背叛祖国和军队。忽然间，他看到了自己刚包扎好的伤脚。他挺直了身体对团长说：“假如我今天说的有半句是假话，如果我存有半点叛逃香港的歪心，就让我像这条伤腿一样。”说着，他一下用力撕去包扎在伤口上的那个医用缚料和胶带。那刚刚和伤口上新生的皮肉结合在一起的医用缚料立刻带下一块鲜红的皮肉，鲜血顿时从撕破的伤口处涌出，染红了冯宁整个脚面和脚踝。而由于钻心的疼痛，冯宁整个人都战栗起来。但他还是坚持以最标准的立正姿势，站在团长面前。

团长关向民愣怔住了。

结束汇报，离开珠海宾馆，宋梓南是和省委组织部部长坐一辆车走的。两人显然都心事重重，车走了好大一会儿，他俩都没做声。过了一会儿，组织部部长终于忍不住了，打量了宋梓南一眼，谨慎地试探性地问：“小平同志认为，大批边民外逃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你觉得他老人家这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理解为，这是小平同志对我们广东省工作的一个批评，完全是因为我们省里的工作没做好，所以才造成了大批边民外逃？”

宋梓南略略沉默了一下：“逃港事件频频出现在我们广东，当然说明我们广东的工作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小平同志怎么批评我们，批评得再重，我们也应该心悦诚服地接受。但我觉得，今天小平同志所说的，好像还不只是针对我们广东的工作，好像还不能把它仅仅理解成对广东工作的批评。”

组织部部长继续试探道：“难道小平同志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前些年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方针和政策都有问题……”

也许涉及了一个十分敏感和过于重大的话题，宋梓南没再接这位部长的话茬，他回避了，把身子往车后座的角落里深深地靠过去，只是把目光转向了潮湿幽暗的车窗外，不再说话了。那位部长当然能明白、也能理解宋梓南此刻的谨慎，于是也就没再议论下去。

一时间，车里变得越发的安静。这种安静令人窒息，也让人每个关节都变得僵直。

按惯例，车先送宋副书记回家。夫人顾亭云和女儿块块都还没睡。顾亭云正在灯下辅导女儿块块做功课。听到门铃响，块块忙跳起，一边叫着：“是爸爸！爸爸！”一边赶紧丢下手里的笔，冲过去开门。顾亭云也忙走过去，从宋梓南手里接过公文包：“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宋梓南笑笑，弯下腰亲了一下女儿的小脸，便径直走到书房里在书架上翻找起来。

“你找啥呢？”顾亭云端着一杯刚沏的茶，走进来问。

“我的一个旧记事本……”

“你有好几十个旧记事本。你想找哪一个？”

“封面上注明‘绝密’两个字的。”

“你那些记事本的封面上，全都注着‘绝密’哩。到底要哪一本？”

“我有一个本子是专门记录省委历次讨论边民外逃情况的。”

顾亭云从一个书柜里取出一个蓝布袋交给宋梓南。宋梓南从袋里倒出十来个旧记事本。稍稍翻检了一下，那个“专门记录省委历次讨论边民外逃情况”的本子果然就在其中。宋梓南拿着它，一句话也没说，就匆匆向卧室走去。走过客厅时，块块想叫住他，张了张嘴，还没叫出口，宋梓南已经把卧室的门关上了。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卧室的门突然开了。宋梓南拿着那本记事本走了出来：“我得回机关去一下。”

顾亭云皱了下眉头说：“多晚了！”

“没事。”宋梓南一边说一边继续往外走去。

顾亭云说：“你没事，不还得麻烦人家司机小杜？”

宋梓南笑笑：“那我就不麻烦他了。”说着，便把记事本装进公文包里，从墙上的一个挂钩上取下一把自行车钥匙，向外走去。顾亭云拿着一件雨衣追了出来，问：“又有边民外逃了？”

宋梓南犹豫了一下，默默地点了点头。

“严重吗？”顾亭云问。

宋梓南没回答。

顾亭云又问：“听说中央来人了，要下大力气整治边民外逃？怎么整治？调部队封锁边境？人心都拢不住了，光靠封锁边境，管用吗？”

宋梓南怔怔地看了一眼顾亭云，反驳了一句：“谁说人心都拢不住了，你瞎说个啥！”推起自行车走了。

司令员和政委回到军区大院，刚走进司令部大楼，党委办公室的一个秘书就急匆匆地迎了上来。告诉两位首长：“军委首长打电话来，请你们马上回他那儿去一下。”

政委忙问：“哪位军委首长？”

秘书答道：“叶帅。”

司令员忙问：“说什么事了吗？”

秘书答道：“打电话的秘书没说别的，只是传达了叶帅的指示，让您二位马上去他那儿。”

司令员政委再不说什么，立即反身又向大门外走去。

司令员和政委赶到珠海宾馆时，叶剑英已经在他住的那幢小楼会客室里等着了。

秘书上前来沏茶。

司令员客气了一下：“这大半夜的，还沏什么茶呀。”

政委笑道：“司令员不稀罕喝茶。这儿要有茅台，拿一瓶来还差不多。”

司令员笑笑：“嗨，别为难首长了。说事吧。”

叶剑英操着带有明显岭南尾音的普通话问道：“你们那个一八四团现在到什么位置了？”

司令员报告道：“刚得到报告，一八四团所乘坐的军列离深圳站还有三小时四十分的路程。”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铺到叶帅面前，并在地图上指出一八四团目前所在的位置。

叶剑英大略地看了一下地图，便把视线又转向这两位大军区的领导，目光炯炯，语调温和地问：“对小平同志刚才关于深圳宝安一带边民外逃事件的看法，你们有什么想法？”

政委说：“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刚才我跟司令商量的，要立即